

世變下琉球知識人的行動策略—— 論蔡大鼎《北上雜記》中的「盛世」書寫*

王喬慈**

（收稿日期：109年10月12日；接受刊登日期：109年12月1日）

提要

《北上雜記》是琉球知識人蔡大鼎在日本侵略琉球廢藩置縣的前後六年之間，乞師清廷時的滯京之作。本文意在探討琉球末世王朝蔡大鼎如何置身在動盪世變中，試圖運用雜記文體表述無法直明的政治書寫意圖。其書中特意記載北京的「盛世」圖景，雖看似與觀光遊記無異，但對比同時期各使節對於北京的描寫，便能知曉其中實具有想像與真實間的差異。並理解在秩序解體、瀕臨亡國之時，琉球知識人並非無有作為，實有其獨特的回應之道，試圖化用所學，以文學「盛世」作為召喚記憶，抵抗並超越現實成敗的書寫意圖，《北上雜記》一書作為時代最好見證，就更值得我們注目。

關鍵詞：蔡大鼎、北上雜記、琉球、書寫策略、盛世

* 本文的完成要感謝廖肇亨、鄭毓瑜兩位師長的批評指正，感謝《國文學報》兩位匿名審查先生悉心審閱，惠賜寶貴建議，始得以完備論點，於此謹申謝忱。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燕行文獻研究中，異國文化的相遇與激盪一直是眾所注目的重心。而琉球文人蔡大鼎（1823-？）《北上雜記》一書，身處晚清帝國動盪之秋與琉球中山國祚的尾聲，其創作背景與目的，恰切讓其別樹一格，具有不容忽視的特殊地位，然現行研究仍寥寥可數，實有深入研究的必要。¹

蔡大鼎，字汝霖，為琉球尚氏王朝末期著名的通事文人。其精通漢文化，尤攻漢詩，往往將異地體驗訴諸筆端留下大量的漢詩作品，如《閩山游草》、《續閩山游草》、《北燕游草》等，為現今研究琉球漢詩不可繞過之重要文獻。《北上雜記》是其生命晚期最後的作品，是書作於 1879 年，日本侵略琉球進行廢藩置縣前後六年之間。蔡大鼎與向德宏（1843-1891）、林世功（1842-1880）等人，仍是寄託一線希望於中國，密謀喬裝北上，欲向清廷乞援，卻求救無門，只能留滯北京。書中記載時間多分布在 1879 年到 1882 年中，對應於 1879 年至 1885 年，蔡大鼎等人上書北京的 28 份救國請願書，實有高度的重疊性。² 因此，若欲討論《北上雜記》一書內容，實不可不將其創作時間與背景納入考量。甚至，在作者對於異國名物經驗的刻畫上，其於自身處境的自覺，亦時時展露筆端，非僅作為記事背景而已。是則，此書的發聲位置與敘事手法，實值得釐探。³ 身處於琉球瀕臨亡國，亦實已亡國的蔡大鼎，又因為自身對於中國的孺慕之情，使其堅信宗主國會基於邦交情誼

¹ 據筆者耳目所及，關於《北上雜記》一書的相關論文研究僅見王振忠：〈琉球漢文燕行文獻的學術價值——以晚清蔡大鼎的《北上雜記》為例〉，《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2 期（2014 年 3 月），頁 88-100。張明明：〈「異域之眼」中的晚清鏡像——以琉球漢文筆記《北上雜記》為研討中心〉，《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 6 期（2019 年 11 月），頁 88-100。日・紺野達也：〈琉球漢文學者蔡大鼎の晩年に關するいくつかの新知見：『北上雜記』・『北京話』を中心に〉，《中國詩文論叢》第 34 集（2015 年 12 月），頁 187-222。其餘多是從琉球漢詩學的角度，討論蔡大鼎入京的驛道詩與其詩學研究。如日・高津孝：〈琉球的出版文化與琉球漢詩集〉，《人文中國學報》第 22 期（2016 年 5 月），頁 279-303。日・上里賢一：〈關於琉球知識人和動蕩時期的中國——為林世功和蔡大鼎中心〉，《國文學論集》第 30 期（1986 年 3 月），頁 67-78。張明明：〈文學書寫中的晚清郵驛場景——以琉球文獻《北燕游草》為中心〉，《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 5 期（2016 年 9 月），頁 65-70。

² 從西里喜行所整理的請願書來看，在光緒五年到八年這段時間，琉球請願書竟有 28 封，此中蔡大鼎參與署名的請願書高達 14 篇之多。見日・西里喜行：《琉球救國請願書集成》，收入《沖繩研究資料》第 13 冊（東京：法政大學沖繩文化研究所，1992），頁 1-148、日・赤嶺守：《清末琉球復國運動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 年），頁 257-285。

³ 如楊仲揆就以林世功自刎殉國作對比，認為蔡大鼎在《北上雜記》中對於林世功死之一事，所述甚短，似有「畏死」、「恐惹麻煩」之情。然而蔡大鼎並未詳述事件的「沈默」，是否只能以膽小怕事來詮釋，或可有其另種讀解可能。見楊仲揆：《琉球古今談——兼論釣魚臺問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 年），頁 86。

必能對琉球伸出援手，故密潛渡京乞師。然而，在北京渡過的六年歲月中，其筆下的中國卻是太平無事，風俗淳美，甚至可以說是「盛世」景觀。單看此盛世書寫，乍看並不奇異，但若我們能想到近代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後，進入一個「邊境喪失」的多事之秋，⁴以及對照同時期各使節對於北京的描寫，或許會困惑於蔡大鼎的敘事策略與意圖，以及其刻意使我們感知落差的「反盛世」作用為何。

若要明此差異，或許必須回到當時東亞各國對於中華冊封秩序的思索與調整來看。蔡大鼎置身在中琉朝貢體制的終點，同時也是各國在西方勢力衝擊後面對中華秩序重新更動的時刻。蔡大鼎等人信賴中國，實際上是反映了琉球在這波震盪、解體過程中，仍堅信冊封秩序的一面。對於琉球問題的不同理解與評論，不僅可以看出其人對於國際秩序的理解與定位，更能折射出其所接受的知識版圖與文化風貌。⁵《北上雜記》反映出球人對於中國期待背後的知識藍圖與心理結構，不僅在朝貢制度上仍信賴不疑，對於中國的信任，某方向也代表了其人的心理期盼，使其把救國責任，皆投注在宗主國之中。

是則，本文試圖在前人基礎下提供《北上雜記》另一種觀看視角，首先先論述東亞諸國使節挑戰華夷秩序下的背後，是立足在文化發語權的掌握與熟練度，再由此對應琉球於各國文化比賽中的缺席，並以蔡大鼎創作實踐為例，反映出其對於中國文化仍以學習為守則，並信從宗藩冊封秩序，這使其人在面對重大危機時，亦將全部希望置於身為宗主國的中國。次則再進而論述《北上雜記》中的書寫策略，比較蔡大鼎在描寫北京制度、風俗、人物等方面與其他使節的差異，並討論其盛讚北京背後的意圖與策略，試圖理解在秩序解

⁴ 金觀濤、劉青峰：《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268-273。

⁵ 若就現存外交文書來看，中國因應琉球的請願，亦努力向外爭取各國意見，以求壓制日本。如出使日本的公使何如璋力主與日本理論，甚至不惜兵戈相見，這與其異國經驗密切相關，使其具有提前認識日本野心的視野，而其所著〈琉球三策〉與黃遵憲的主張，亦關聯甚深，這可反映出當時清末知識人站在世界脈動上，回看歷史政局的清醒眼光。而保守派李鴻章（1823-1901）則未能認識新局，僅實行消極拖延政策，認為琉球乃「區區之貢」，不想因此而與日本衝突，耗損國力，處理琉球、朝鮮等事件，皆可看出其仍受限於傳統天下秩序地華夷觀念。除了大使們的聲音之外，民間聲音對於「存琉」與「棄琉」一直都有不同的聲音激盪，如流亡香港的王韜撰〈琉球朝貢考〉、〈琉球向歸日本辨〉，發表在當時極有影響力的報刊《循環日報》上，力辨日本國內試圖在歷史依據上合理化侵略琉球的意圖，引發相當多爭論聲音，同時期《申報》亦有多篇刊物，表達當時中國對於琉球亡國時的各種意見。探討此時東亞知識人對於琉球所屬問題的討論，不僅是作為外交政策的考察，其中，更決定性的是觀察中日琉對於秩序的認知與界定。相關研究可見日·西里喜行著，孫薇譯：〈鴉片戰後東亞的外侮與琉球問題〉，收入張啟雄等編著：《琉球認同與歸屬論爭》（臺北：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2001年），頁127、林明德：《袁世凱與朝鮮》（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頁381-394。另，關於琉球與日本之間的關係，新井白石亦著有《南島志》，以方志體說明琉球自古就與日本密切相關，雖其中不無政治意味的宣示意義，但亦可補此脈絡。見日·新井白石：《南島志》，收入日·今泉定介、市島謙吉編：《新井白石全集》（東京：吉川半七出版社，明治38年）一書。

體、瀕臨亡國之時，琉球知識人如何運用其所學，實踐救國行動。最後論及《北上雜記》一書所運用的文學「虛構」之方法與反思，透顯出文化價值在現代性的風暴下，亦能得以於現實危機中體現張力與意義。

二、十九世紀後東亞諸國的華夷秩序與文化競賽

本節集中討論十九世紀東亞諸國華夷秩序內部的鬆動與變相，在西方現代性進入之前，日本、朝鮮、越南諸國之間，早已開始對華夷秩序有所反思。⁶所伴隨而來的現象，主要呈現為使節間的文化競賽，從效華、競華到取而代之，甚至致力脫亞接軌西方，可看出對於中華秩序不同的思索與變貌，決定了如何應對新局的方式。然而，琉球久米村出身的蔡大鼎，對於文化中國由衷地欽慕，使其致力浸潤漢詩文技藝的習練上，因此，不同於諸國顛覆秩序以存亡的方式，蔡大鼎所反映出琉球慕華派身處中日新舊帝國政權以及近代與前近代等複雜情勢交會的特殊時刻，則能以其畢生所學之文學技藝，毫無保留的承擔起救國命運的實踐。

（一）效華與夷變——諸國對於華夷秩序的各自體認：

眾所皆知，東亞朝貢秩序與華夷秩序中的世界觀密不可分，呈現出以京城為中心，放射狀的同心圓架構。若離京城愈遠，則呈現為一文明到蠻荒的漸進展現。此中的「蠻」實不完全是地理因素，而是受到文化價值影響的心理結構。中國士人有此南北地理因素的文化建構，自然不意外，但若考察琉球士族的漢詩文，將會發現，其中所表現的認同感亦與此呼應，如使節在朝貢入燕京時，往往展現出登臨到文明燦爛之國的仙境。此固然與琉球在明代入宗藩制度，受到中華文化與漢字等影響有關，但這亦涵蓋著對於華夷秩序的全盤信任與承接，使其人對於中國文教制度，無不致力模仿與學習。⁷如從琉球第一部漢詩集

⁶ 亞洲本身的經濟與政治秩序，其實與朝貢冊封制度密切相關，自有其影響與勢力範圍。濱下武志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研究亞洲體系的形成，並非來自於歐洲的衝擊，而是透過朝貢貿易，建立起自身的秩序，因此亞洲本身的「近代化」，亦與中國自身與周邊各貢國朝貢關係發展相關，且貢國亦非單一秩序，而是多邊複雜貿易關係的地域圈。見日·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頁1-360。

⁷ 中國亦有教授琉球子弟的國子監教育，如琉球官話課本皆可見出當時琉球官生入國子監時所學習、授課、作詩文等狀況。見廖肇亨：〈來讀天都未見書：從官話課本看十八世紀琉球渡唐生的中華體

《中山詩文集》中可以看見，詩人多歌頌清帝，在京朝貢時所作詩文亦多流露出對天國的由衷頌揚、頂禮膜拜。正如廖肇亨指出，琉球使臣在進入北京時，創作所見皇城宮闕的漢詩，無不以「仙界體驗」為旨，致力描寫「神京宮闕」與「梵宮睿藻」景況，鋪排陣容壯盛的朝班與北京美好愉快的體驗，如入仙境。⁸可見琉球使在行往北京的貢路之旅中，有一種親臨文化聖地的雀躍崇拜心情存在。

然而，這樣崇尚中華作為實體的秩序觀，也非永遠都是固定不變。若就階段論來看，華夷秩序下的展現，可從中國為華，封貢諸國為夷，再到反轉主客，以諸貢國為華，中國為夷，並不承認宗主國就享有比較高階的文化價值。如朝鮮、日本、越南的「小中華」意識，呈現出在朝貢秩序下，諸貢國彼此間展現的「競華意識」，使華夷文化秩序仍會有翻轉與位移的可能。

在中國的諸多封國中，越南對於文化自主性強調，實可值得我們留意。其不僅不再只有慕華心態，更將華的決定權倒轉過來，顛覆了以北為尊的價值依序，認為自己才是「位居中心」，並以「中國」這詞自我指稱，不讓「中國」名號讓渡給「中國」專有，越南儒者李文馥（1785-1849）就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例子。李文馥出使外國經驗約略十一次，所撰寫的相關作品二十多種，如《大南實錄·李文馥傳》所記載其從明命十一年（1830）至紹治元年（1841-1842）奉使燕京，出使之地之多，幾乎可稱為「周遊列國」。而李文馥最為知名之事，可以說是撰〈夷辨〉一事的始末。李文馥自幼學習儒典，自然通曉天下秩序與華夷遠近的文化深淺之別，他對華夷秩序的深深信任，卻呈現和前述琉球詩人相反的面貌。他並不視自己為華夷秩序的「夷」，反而行使「華」的權力，倒轉秩序，以清朝為「夷」，因此在明命十二年，護送飄風船官眷等人回福建時，他看見福州招待越南使節的館舍為「粵南夷使公館」時，憤而使人碎裂夷字才入館。這次事件甚至讓福建官員將館名改易為「越南國使官公館」，成功做到一次平等的外交禮儀示範。⁹

在面對一向以中華文化自居的中國時，李文馥取用的資源，雖然仍是六經孔孟程朱，但文化卻並不因出生地而決定，而是取諸國家的自覺與習潤。如其撰〈夷辨〉以揭示諸人，特明「華而不為夷，不夷而乃夷之，此則不容以不辨」，曰：

驗》，收入林文月等編：《鄭清茂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花蓮：國立東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33-166。

⁸ 廖肇亨：〈星槎收盡域中奇：從《中山詩文集》看琉球漢詩中的自然風物與人文景觀〉，《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6卷第1期（2016年3月）頁5-25。

⁹ 關於李文馥相關介紹，可見陳益源：〈周遊列國的越南名儒李文馥及其華夷之辨〉，《越南漢籍文獻述論》（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225-236。

以言乎治法，則本之二帝三王；以言乎道統，則本之六經四書。家孔孟而戶程朱，其學也；源左國而流班馬，其文也；詩賦則昭明文選，而以李杜為歸依，字畫則周禮六書，而以鍾王為楷式。賓賢取士，漢唐之科目也；博帶峨冠，宋明之衣服也。推而舉之，其大也如是，而謂之夷，則吾不知其何如為華也？……通乎華夷之後，但當於文章禮義中求之。¹⁰

因此，若華夷以文化標準來分判的話，越南早已繼承了傳統，是真正的華。但須留意的是，李文馥雖反轉了華夷的位階，但並未跳脫此秩序結構。其所取用、援引的標準，仍是如何成「華」。意即是：若不在儒家道德脈絡下的其他文化，並不足以安放在此套秩序中，可見其仍離不開華夷秩序的架構，只能擺盪在二元對立之間，仍以「華」作為衡量諸異的標準。即使其接觸了西洋事物，而使心態能高於「中華」而有華夷之變的轉換，但從根本上來看，仍未能反省到此套秩序在面臨現代秩序崩解後的不相應。因此，其雖能在面對中華時展現了「不辱使命」的自尊，捍衛了越南國體，但在真正西洋入侵時，面對法國船隻的侵擾與污辱，卻未能有效處理，以至「帝怒其有虧國體」而面臨解職之命運。¹¹

（二）維護國體——使節中的文化競賽

華夷秩序的轉變，亦反映在各國使節的文化競賽之中，而漢詩文技藝作為中華文化的凝縮展現，更是兵家必爭之地。¹²當使節出使他國時，言行舉措皆是名分禮儀的展現，與自己國家的優越性息息相關。如在萬曆十八（1590）年入華的日僧策彥周良（1501-1579），就深知此理。其熟稔漢詩文素養，早在九歲時，「凡朝經夕梵，觸耳輒諳，過目輒誦。師驚嘆為天稟」¹³，甚至很早就學會作三體詩，並每日練習。當寺廟失火時，眾人皆抱營生工具，自己獨抱三體一冊，而得到師傅的讚賞：「此兒異眾，真釋氏種草，必當興吾門。」由此可見，當時佛門必須學詩，學詩對於興盛佛門香火一事極為密切。而這也由周良成功

¹⁰ 越·李文馥：〈夷辨〉，《閩行襟詠》，收入《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第12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57-262。

¹¹ 參照陳益源：《越南漢籍文獻述論》，頁232。

¹² 明清之際，朝鮮與日本的往來筆談中，就可清楚看見日、朝兩國間時常有一種「文化間的比賽」，如葛兆光指出朝鮮在遣使節赴日前，早已有競賽的準備，李朝(1598)在選擇赴日使者的標準為漢詩技藝之優劣，如金誠一〈贈寫字官李海龍並序〉：「聞倭僧頗識字，琉球使亦嘗往來云，爾等若與之相值有唱酬等事，則書法亦不宜示拙也」可見遣使的謹慎，見葛兆光：〈文化間的比賽：朝鮮赴日通信使文獻的意義〉，《中華文史論叢》2014年第2期（2014年6月），頁1-61。

¹³ 日·策彥周良著，日·牧田諦亮編：《策彥入明記の研究》，收入《策彥和尚初渡集》（京都：法藏館，1955年），頁78。

的從華返日，完成朝貢之事後，聲名大噪，寺院香火不絕的記載中看出，禪僧的漢詩文素養與其為國家完成使命，密不可分。甚至也正因為周良的出色技藝，使其在華的表現可說是備受矚目：

九日秀才數人來，余適在正使和上處，……又少焉，秀才四員來，和上與余偶對談，不敢顧視。秀才請筆硯，書云：「我輩俱學中人也。聞公有斯文之雅，特來拜。何不我禮也？」余即起刷衣而伸禮，禮了又書云，曾聞佳作有「打蓬風雨亦詩聲」之句甚高。（頁66）

不僅是琉球使節向周良請詩，如其九日記載：「琉球人寄善乞詩」（頁128），甚至連文化宗主國的中國士人，亦對其詩文讚嘆有加。其詩句名聲，亦在未入華前，就已流傳於士林，使士人爭先請見，這在其他使節是罕見的。且若我們考慮到周良入明時，因明朝上下皆因懼倭與寧波事件的陰影，多對日人有所防備與輕視，但周良其卻能以傑出精湛的漢詩技藝，展開出色外交。¹⁴周良出色的書信表疏能力，不僅在政治上能維護國體，不辱君命。在與各國使節、中國士人的來往交際中，亦能以其文采橫越華夷國族等障礙，掌握文化的發語權，進而維護國體。如可從其在嘉靖十八年二十一日一條中展現：「周通事來，予筆談云，吾國高出於朝鮮琉球之上，是曩昔以來之規也。……然近年指吾國王使臣，枉呼夷人何哉？」（頁51）可見其在筆談中，亦致力於華夷的翻轉，不甘再自居於夷，甚至隱隱有高於眾國的自詡意識。這使我們知道，掌握了漢詩文素養後其文化自信亦足以使華夷有了顛覆，而這在東亞使節的彼此競賽之中，亦並非是孤證。清代以後，本在封貢序列中的越南，因國力的盛大，使其競爭意識較他國更為顯著，甚至步步為營，深怕自己有弱於人。¹⁵如黎貴惇清楚知道同文之國，相互競爭的載體往往在於筆談交際之中，故氣勢不可先遜，不能自貶為狄，方能並駕齊驅：

¹⁴ 關於寧波事件等相關背景，請參見鄭樑生：〈嘉靖年間明廷對日本貢使策彥周良的處置始末〉，《漢學研究》第6卷第2期（1988年12月），頁191-211。

¹⁵ 李焯然：〈越南史籍對「中國」及「華夷」觀念的詮釋〉，《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2008年3月），頁10-18。當中所指「中國」實越南自稱，並非指明人政權。當時越人採用漢人政權慣用的「中國」是有特別的用意。此舉一方面否定明朝的天朝和政治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則將「居天下之中」的中國觀念據為己有。張崑將則指出了使臣在對外關係上的「各華其華」與史臣「各帝其國」的雙向策略，如越南史書皆未以「中國」稱呼過中國，而多以朝代名稱之，並以自己為「中國」，展現了政治主體性，在外交上自然也衍生出「各華其華」的文化主體性思維，完成屬於自己的「中華秩序」，「或許是中國朝貢藩屬國之中最為脫逸的一個國家」，見張崑將：〈越南「史臣」與「使臣」對「中國」意識的分歧比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12卷第1期（2015年12月），頁167-191。

古人論奉使，以文學則須博洽多聞，以詞命則須婉正得體，然氣自不可不善，蓋內外尊卑，勢位殊別，若望風而先餒，與以羌遠自處，簡交寡言，必為人所鄙薄。¹⁶

可見不能因身為「遠夷」就「望風而餒」的態度，似乎是此時越南使臣的共識，其人不僅在面對華夷秩序時勇於挑戰，落實於外交應酬之餘，亦時刻提點自身，以不辱王命。因此，黎貴惇在與朝鮮使臣的筆談時更加仔細應對，即使他們皆「一時文豪」，但其仍使「文字酬答之間，幸免輕哂，更見稱揚」（頁12）。遇到問難談辨者，亦小心謹慎，「殆如遇敵」（頁12）。而阮述即使在風雨飄搖的戰爭時日，北上乞兵，但逢筆談之際，亦不免流露對於越南享有文化風雅的自信，如其載：

陳蔑舫過談，又請書聯扇。因言此地從前未見我國人，今始見之，究竟是文雅之邦，使臣又皆明達之士，故人人艷慕，欲得其文字。昨有友人，自朝鮮回，見筆談諸紙，甚為欣賞。謂朝鮮士人專以對句取士，故文章多不清順云云。¹⁷

從文中不無驕傲地展現眾人「欲得其文字」的現象，無論其中是否多少有自詡的成分，但就其詩歌雜詠來看，不得不肯認越南使者的文化素質，實具有相當程度的素養。¹⁸值得注意的是，越南使臣既然飽讀詩書，熟稔漢詩技藝，心裡的「敵人」在當時東亞朝貢制度下，主要仍以最得中國風華的朝鮮為對象，甚至直而上之取代清朝。雖然琉球亦在同文封國之中，但使臣擅長的多是書法形貌，文辭往往略遜一籌。¹⁹如李文馥曾觀察琉球使臣的筆談，指出：「筆談間字畫亦楷正，惟辭語頗澀，殊令人不甚暢」，亦曾作詩婉轉表達兩人的高下之分：

¹⁶ 越·黎貴惇：《北使通錄》，收入《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第4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

¹⁷ 越·阮述著，陳荊和編註：《往津日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43。

¹⁸ 若考察阮述《每懷吟草》所收錄的詩作，就會訝異其詩質量精純，實不遜於與其唱和的諸多清儒，可見越南使者的挑選與培訓上，皆有意著眼於漢詩文的技藝鍛鍊，好在遭逢外交場合時，恰如其分的賦詩言志，展現自己外交與政治使命。關於越南使節選拔、挑選與組成上，可參見陳國保：〈馳驅臣分敢言勞，事濟功成皆國慶——清代越南入華使臣的考察〉，《清史研究》第3期（2017年8月），頁94-111。

¹⁹ 從蔡大鼎的文集記載來看，其書法甚佳，在北京的旅途中，亦多關注筆墨店鋪等事，友朋亦頗識書，但文章通順程度則略遜華儒。

所見何如昔所聞，重洋夢醒各天雲。琉球使驛程由海，襟袖文儒飭用紋。最喜禮文同一脈，為憐筆墨遜三分。茫茫客汎誰相伴，半卷陳詩語夕曛。²⁰

可見使臣皆雖有唱和互贈，交相往來，但身為「禮文同一脈」的同文之國，自然不免以誰對「文」的把握更精當，而在心裡上有所較勁。

（三）師友佳藻一一就正——蔡大鼎效華在漢詩技藝上的體現

上述的較勁意識，並不常在琉球使臣的詩文中少看見。正如前文所述，琉球久米村儒者於中國關係密切，辦理朝貢事務，實踐王命幾乎是其生命中最大要事，自然不可不熟讀漢詩文。但熟讀浸潤有之，卻少有人如同蔡大鼎般近乎迫切般學習詩文技藝，其留下的琉球漢詩文產量之盛，是現存琉球漢籍文獻中，著作最豐者。

然而，如此創作力強盛，又熱愛作詩酬唱的蔡大鼎，其生平中有五次入中國，與當地官員、外國使節交往應酬次數，絕不比他國使節為少。但觀其書信往來，卻絲毫不見任何自傲與競爭的自負心態，與之相反的，往往展現出謙遜學習的誠意，以及努力鍛鍊自己漢詩技藝的用心。如在其屬於草稿實驗性質的《欽思堂詩文集》中，就收錄了六百多首漢詩對句，文備各體，「詩句足協頡元白」，可以看出其嘗試各種筆法題材的雄厚企圖心。²¹一直到入華所作的《閩山遊草》、《續閩山遊草》、《北燕遊草》等詩集，多以遊覽唱酬、思鄉寫景為題，可以看見其漢詩正逐漸成熟，「已啟唐音」，如〈北燕遊草序〉中所言：「將六經四子之義蘊，發揮而明闡之，行見道德仁義，經緯天地，以各正其性命之正。格律渾厚，風度端凝，故不襲前人之窠臼者矣斯。」²²不僅逐漸達到當時詩壇上所追摹唐風之典範，詩風亦從以往的元白之俗體，逐漸形成清麗純正，深得六經之奧旨的自我風格。此中重要的轉折，當在於其深以華儒為師的自我定位上，如文集中多所刊載其央請華儒代為潤筆、

²⁰ 越・李文馥：《閩行襟詠》，頁 264-265。

²¹ 《欽思堂詩集》題材多樣，對比於《中山詩文集》所收錄的琉球漢詩，亦可見風格之異。琉球漢詩人多擅長七絕，較少看見其他形式的嘗試。而蔡大鼎卻勤於練習各種體式，不僅七律七絕，如古詩、古歌、近體五言、七言、雜言皆有。所涉及的題材內容亦多樣，如記載獅子、美人、虎、龜鶴、馬、圖畫詩等，尤其擅於處理艷體詩種種遊戲詩作，亦是可資注意的地方。關於其艷情詩研究，可參見日・高津孝：〈蔡大鼎の漢詩文と琉球の遊里〉，《龐大史學》第 63 卷（2016 年 2 月），頁 1-28。

²² 日・蔡大鼎：〈北燕遊草序〉，《北燕遊草》，收入日・高津孝編：《琉球王國漢文文獻集成》第 28 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1-2。

改正詩句的痕跡，²³在蔡大鼎的心裡，其對於自身的詩文技藝，永遠處在一種「未完成」的學習狀態，即便其後來詩文已漸趨完善成熟，但仍不斷對於著作進行修改與請教。正如其《北上雜記》所述：

會有友人，將其編次雜記，看了一遍，乃曰：「短句粗語，均刪去冊中可乎？」予曰：「不必如此，余自年少，以逾下壽，其所述贈答，不論字句之長短意味之淺深，蓋為騰存俟有華儒之就正，而後梓行。……其友亦善之予復曰：「本國文人，所作詩文，儻或不請華儒讀之，則難乎免有粗魯之弊也。」²⁴

可見這是蔡大鼎從年少至老耄就已養成的習慣，無論文章的淺深俗雅拙劣，皆一一保存，謄抄刊行，甚至不惜花費龐大潤筆之資請儒者刪改。²⁵這樣的現象與前述使節們彼此較量的心態可以說是南轅北轍。當朝鮮與越南儒者在文章場中彼此競華，但蔡大鼎卻僅以學華、慕華為歸，其入京後多與地方官員酬唱和，但多以學習者的心態敬之，絕無「應敵」之感；他亦曾與朝鮮使節進行資訊交流，但亦未若如越南使者帶著「匹敵」之心，打探並收集國情的心態，²⁶多半是虛心問教，請教在地風土知識。²⁷這樣虛心向學的努力，或許若以黎貴惇等使節來看，是一種自甘處於下風，氣勢先遜華儒之心，無法擁有掌握文化發語權的一天。然而，這卻反應出在東亞朝貢秩序下，各國以各自不同方式對於身為「母體」的中國，實踐其價值秩序。蔡大鼎出身於琉球久米村，自幼所習染者，皆是儒典與中華詩文，所學習的教育，亦是為擔任往後朝貢制度通事官員所準備，漢文化實與其生命史密切相關。對舉於越南、朝鮮使節在外交場合上的各相爭競，用以實踐王命，以護國體。在蔡大鼎的心裡，學習漢詩文，並幫助封貢行事，這亦是一種王命的實踐。國體的塑造並不在

²³ 日・蔡大鼎：《欽思堂詩文集》，收入日・高津孝編：《琉球王國漢文文獻集成》第26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35。

²⁴ 日・蔡大鼎：《北上雜記》，收入日・高津孝編：《琉球王國漢文文獻集成》第28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6-27。本文引用此書皆出自此版，僅標頁碼於引文後，不再另注。

²⁵ 其文集中頗多書信與華儒商議稿費寬貸的時限，反映出自己即便入不敷出，但對於修飾作品的堅持與用心，如〈寄送存留官陳元輔啟・附片〉：「多謝足下為弟用心，自發洋銀陸元玖角，以墊潤筆之資，本應火速奉趙，奈家資貧乏，不能如意辦理，乃見汝胞弟陳秀才，如汝所言，遞交利息加一半契卷以寬償還之期。」，見日・蔡大鼎：《欽思堂詩文集》，頁73。

²⁶ 陳國保：〈越南使臣與清代中越宗藩秩序〉，《清史研究》2012年第2期（2012年6月），頁63-75。

²⁷ 如蔡大鼎在《北上雜記》中曾仔細記載其曾與朝鮮人討論「人蔘」的選購方式，曰：「四譯館附近皆人蔘店，其參色有白與黃之殊。未知孰好，聞之於朝鮮人說道，其白者山產，黃者家產，但中國人不知其優劣，而貴黃色。其色係製成者，藥氣已漏，不必尚之。按此近是。白色之價殆倍於黃色，是余曾經購之而所知者也。雖然本國人，亦貴色黃，由來久矣」可見在其心裡，無論各國知識皆根基於自身的風土經驗，都能效法與學習。日・蔡大鼎：《北上雜記》，頁5。

於呈現夷變為華，而是猶如事父事君之道，透過學習產生拉引的力量。琉球與中國兩者是同宗而親，在華夷秩序下，是相互靠近而非取代的親密關係。²⁸

因此，乍看之下蔡大鼎的漢詩技藝，好像尚未成熟，不足以開展更進一步的變體之用，起到批判整套程式、體系的能力。²⁹但卻正是這與宗主國始終保持親近的文化心態，反而呈現出琉球儒者在面對世變中的特殊行動。若我們只從技藝高下衡諸其詩文成就，或許就會忽略了文學敘事的特殊性，以及不同知識結構下，人的行為範式本該有的多樣可能。在蔡大鼎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琉球誠心欽慕漢文化的一個重要側面，雖然他未發展出顛覆、取代中華、甚至「脫亞入歐」的知識結構，但在這價值碰撞的交會中，仍可看出歷史洪流中「小儒」是如何以其畢生所學的技藝，來抵禦近代性的席捲。

三、蔡大鼎《北上雜記》中的盛世書寫

本節主要討論《北上雜記》的書寫內容，詳述蔡大鼎在雜記中如何基於個人知識結構以及敘事技巧，使其觀看北京的視線中展現出特殊關懷。如前所知，此書創作背景時起於琉球瀕臨滅亡之際，蔡大鼎一行人，因琉球王尚泰（1843-1901）所吩咐，前往北京乞師救援，盼清朝實現封貢制度下「興滅繼國」的承諾。然而在面臨世變之急，眾人奔走之下，是書中的敘事紀錄卻意外呈現出風俗盛美，太平無事之感。此現象實有二點值得我們注意：一是與現實背景中，琉球知識人的失望與急迫差異甚巨。二是此書中的盛世書寫，與當時

²⁸ 蒙審查人提醒，中國詩人有不少關注琉球漢詩者，但因晚清以來的知識變動極劇，對於域外漢詩的關注，尚無法如他國關注中國詩家那樣深刻。此慧見使筆者注意琉球漢詩人亦不完全弱後於文化比賽中，應當注意此中的「話語權」性，如中國詩論家亦有不少對琉球漢詩人的重視。如廖肇亨就指出清代法式善（1753-1813）對《中山詩文集》的琉球漢詩人作品如周新命、曾益、蔡鐸等，讚譽有佳，可見兩者能夠透過共享的漢詩技藝，心意相通。見廖肇亨：〈近世東亞海域與文化交流專輯導言〉，《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6卷第1期（2016年3月），頁1-4。

²⁹ 如觀看蔡大鼎諸多文集，或許會訝異蔡大鼎對於政治的不敏感，不僅是在北上雜記中少見，甚至是前幾次朝貢入唐的旅途，他不可能沒有見到當時港口情報的變化，以及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種種挑釁。但在他的詩作裡，多仍以寫景為宗。但若反觀越南使者的詩作，往往反映出一定的批判性。如阮述（1842-1911）《每懷吟草》就是其於1880年以正史身分使清時的詩作結集。那時中越朝貢已近尾聲，困局情勢也反映在詩作中。如〈即事二首〉「臥塌忍容他族處，向隅遑問一人悲。十年烽火銷沉盡，回首牛江淚暗垂。」、「壯遊人盡侈輕肥，欲效乘槎事已非。遠海驚看牛馬及，同盟誰念輔車依。衛禽啣石空嗔恨，越鳥巢男敢倦飛。聞樂不妨重拜教，秦庭應為賦無衣。」可看出當時對於國家淪於異族的憂心。期盼清朝能起兵救援，如「燕闕頻年通玉帛，邊城何日靖氛煙。」〈潁川書院閱前屬使臣裴珠江題壁之作悵然有懷因步其韻〉越·阮述著，陳荊和編註：《往津日記》，頁100、63。

的北京現象亦有所不同。蔡大鼎於《北上雜記》中透過地誌異聲，呈現出人文文化成的「盛世」風貌，而忽略了北京當時慘澹危急的真實世界。對照同時期日人眼中的北京疾病叢生的描寫，以及同屬東亞朝貢一環越南使節對於西洋現代性介入下對於危機的敏感覺知，三者呈現出的北京可說是南轅北轍，實值得深入釐探。

（一）南北風土與文化建構

日本終止琉球朝貢中國後，蔡大鼎等人匆忙至京乞師支援，卻未料到一待就是六年。這六年間的經歷，其皆有日記保存，雖多所散佚，目前僅得見《北上雜記》中的卷一、卷二，但這仍是目前我們得見中琉朝貢關係的最後餘暉。³⁰相較於琉球脫清人（包含蔡大鼎）等人共同署名上奏的二十八份請願書裡的正統大義，《北上雜記》對於此事件的描述，可以說是平淡而隱晦的。除了記載 1880 林世功自刎絕命書、詩外，相關事行並未多見。但我們仍可從這六年來的長時段中感受到清朝的忽略與延宕，以及蔡大鼎無可奈何地等待。在陳請失敗，最應該感受到強烈失望與憤怒，並宣之於日記記載的常理下，《北上雜記》的書寫內容，幾乎可以說是溫柔敦厚。不僅沒有任何惡言，反而呈現出北京的美好盛世景觀。我們可以先從蔡大鼎在《北上雜記》中一則有意思的紀錄談起：

余留京師已久，不啻風俗之美，而路上行人，未見癩者，則地靈人傑亦不言可知。
（頁7）

此條乍看之下，只是蔡大鼎抒發心情，表達其滯留在北京多年，所見不僅風俗醇美，連路上行人，亦未見癩者，可見中國果真地靈人傑。但若想起最早撰寫《使琉球錄》的陳侃（1489-1538）當年出使琉球時，亦有「國無醫藥，民亦不夭札」的離奇評價，試想，血肉之軀，如何無病，實違反我們一般常識話語，³¹兩者相互而見，可以看出此中有一相似

³⁰ 紺野達也發現福州圖書館所藏有《北上雜記》後半部資料，並指出是書在福州是以四冊本刊行，（把目錄的五卷分成四冊形式）但因書目珍稀，目前尚未能公布於外，故筆者僅能以目前所見的卷數撰文分析，並參考紺野達也針對卷末等相關材料所著的文章，見日・紺野達也：〈琉球漢文學者蔡大鼎の晩年に關するいくつかの新知見：『北上雜記』・『北京話』を中心に〉，《中國詩文論叢》第34集（2015年12月），頁187-222。但此文主要仍是以《北上雜記》附錄所列的北京官話為分析重點，故未增列其餘文獻，仍需等待此書之後的出版，方能為文補論。

³¹ 關於琉球當地的疾病狀況，學者已論之甚詳，詳細分析可見廖肇亨：〈從《琉球百問》看清代中葉琉球貴族的疾病與社會生活〉，《浙江工商大學學報》第6期（2010年11月），頁39-43。

的文化脈絡存在。如陳侃因為颶風侵琉一事，看見球人挽舟之力、官員辦事之勤，不禁有感而發曰：

生有膂力，耐飢渴勞苦，熱壁挽舟之時，雖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而亦未嘗告病。匪直賤者若是，雖酋長之貴亦慣動動；大風暴雨，雖夜必興，相與徒行露立於港邊以防舟之漂蕩焉，而寒濕不能使之疾也。國無醫藥，民亦不夭札，或壯、或老始生痘疹。地雖卑濕，而不見其疲癯殘疾之人，是豈盡出於稟賦哉！亦由其薄滋味、寡嗜慾，元氣固而腠理密也。³²

當然，若對照起陳侃所處的時代，或許多少是出於對嘉靖皇帝生活型態的諷諫之意。但更須留意的是，陳侃是一名朱子學者，他對於琉球的想像，仍是以儒學經典所訓誡的「薄滋味、寡嗜慾」來投射他者，想像琉球。認為他們對於官事之所以如此勤勞，是因為去欲循理，不重感官享樂，才能夠實踐「元氣固而腠理密」的無病狀態。因此在陳侃心裡，琉球成為實踐儒家文化理想的典範，好用以對舉明代皇室的縱慾現狀。此時文明的指標不在中國，反而在夷遠的琉球。再回到蔡大鼎此文所述，從其在北京的感受而言，他心中的文明投射，反而是中國，以往從書中感受到的美好風俗，都一一於眼前印證。但必須注意的是，疾病往往具有隱喻性，並非單純客觀事實。³³蔡大鼎舉出的「癩病」，其實有相當程度的文化含義。「癩病」，若就現代的疾病名稱來說，其實就是「癲瘋」，而癲瘋在中國有一不斷被污名化的進程。³⁴

若理解癩病（癲瘋）背後具有這樣的文化意涵，那麼此條就不可單純只以現象簡單帶過，反而應該細思為何蔡大鼎對於北京風俗文化的想像已到達了相當的高度，而此中之所有有這般文明的展現，更是與接近京城的核心密切相關，皇恩所化，由近及遠，北方的文明仍大於偏遠的南方——福州與琉球。這樣凸顯北京風俗盛美的敘事方式，成為其異國體驗的一個書寫重心。正如其〈風俗記〉所指：

³² 明·陳侃：《使琉球錄》，收入《使琉球錄三種》（臺北：大通出版社，1984年），頁30。

³³ 蘇珊桑塔格反思癲瘋、結核、梅毒、愛滋等疾病是如何從身體疾病的中性狀態，在社會中不斷被建構為具有道德意涵的隱喻，逐漸擴大成為批判與壓迫。如其談論癲瘋，認為它在中世紀以來長久帶給人的恐懼，使其擁有特殊的懲罰性質：「沒有比賦予病意義——該意義必定是道德意義——更具懲罰性的事了。任何病只要其起因不明、治療法無效，就容易被意義所覆蓋」見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臺北：大田出版社，2005年），頁75。

³⁴ 如梁其姿曾研究中國癲瘋病的認知演進史，發現癲瘋一開始，是一門因風所致的病徵，雖不知成因，時有歸咎於家族命運等帶有神秘感的危險性。但到後期逐漸發展出一種非「正經」的風症，被視為透過「性傳播」傳染，成為「他者——半開化的南方人的疾病」，逐漸被貶低。見梁其姿：《麻風：一種疾病的醫療社會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33-44、103-104。

茲稽《都門雜記》，其略有云京師風俗最為醇厚，筆難盡述。余在此多月，果如其所記，不任仰慕之至。且謂大凡國俗之善美，人才之蔚起，皆因皇都之遠近，各有分別。至若縣城之中，強似城外，其府城省亦無不然，因顧本國，均類於彼，則理之當然乎哉。又最尚繁華……皆雕梁畫棟，金碧輝煌，令人目迷五色，至肉市酒飯館，張燈列燭，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處可及。(頁13-14)

若觀此則文字，不僅沒有黍離麥秀之感，反而滿紙金粉，繁華滿眼，大可想像蔡大鼎到北京時感官應接不暇，所接觸到各種多樣熱鬧的訊息與知識。不僅如其〈物產地理記〉中所述的豐榮之感：「正覺物華天寶，即此地也。至若稽察上古以來，所都地方，皆在西北處所，亦知地靈人傑，即此地也。」(頁2)京城在人才方面，亦鍾靈毓秀，濟濟一堂。如其日記中，亦特別記有〈姚氏請傭計〉一篇短文。用現今的眼光來看，就是一封求職文章，而且還是一封為其店內伙計轉職所寫的介紹文，作者是一個名不經傳的掌櫃，但蔡大鼎卻愛此信文采可讀，甚至全文錄之(頁39)。然而，人才之盛，除了與首善之都有關，在蔡大鼎心裡，或許科舉制度更是一個重要關鍵。

(二) 知識結構的差異：舊學與新學之別

蔡大鼎相當濃墨重彩、鉅細彌遺地抄寫當時科舉制度的實施景況，這固然與琉球官制世為世襲，未有如同中國般全面科舉制密切相關，但這亦非僅只是一種好奇、窺伺心態，反而呈現出對於中國舉制的讚賞與效法意圖。如其描寫當時讀書人中舉的興奮狀態，記載「一甲之狀元榜眼探花三名，騎馬朝回，奚勝羨慕之至，即古詩所謂白馬掛金鞍，騎出萬人看」，這之中，或許有某種欣羨之心，若對照當時琉球官制來看，琉球雖有導入中國官制，於乾隆實行科舉，但仍有琉球獨特的官職，亦不同中國考試取制，如法司等高官，僅是居住在首里的王族七姓方能擔任，久米村士族雖亦能從事仕途，多僅是通事，最多到紫金大夫。³⁵因而，蔡大鼎對於科舉制度不僅以大量篇幅詳述，如〈貢舉記〉、〈殿試記〉、〈欽定中額記〉、〈額中舉人記〉、〈會試覆考記〉、〈殿試傳臚記〉、〈狀元榜眼探花記〉等文章，列舉諸制細節，甚至指出當時清朝的科舉制度，已無前人所言的弊病，已為「功令森嚴，

³⁵ 當然仍是有例外的狀態，如蔡溫、鄭炯等人的破格，被拔擢至法司，同七姓般具有王族的地位。見米慶餘：《琉球歷史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48-51。

場中弊病，早已剔除盡絕，此不可不慎焉。」(頁14)，或許有為之後琉球官制求一改正之效。

但若比較同時期，對於科舉制度反思的東亞知識人，就能知曉蔡大鼎仍處在孺慕中華文化，而不見此箇中之病的傳統視域裡。先不提明清以降，儒學士人內部的自我批判已興。在幕末明治初期，日本漢學家的旅中日記裡，就充滿了對於中國社會清冷的觀照與反省。如於1862年奉幕府之命，搭乘千歲丸來華貿易、探訪的納富介次郎，就已經注意到清朝的現實問題：

清國本為文學無雙之國，卻無治理國家之論。且近世之風，有志者無不為己，偏貪科舉，這些落榜的科舉文章成為虛驚徒勞之弊害，縱令尊文藝，又何必如此耗巨資，自己落入虛文卑弱的境地，遂不能治理本國。內為長毛匪受苦，外受夷狄所制，實清國危如累卵，值得可憐。³⁶

認為清朝之所以處於內有太平軍之憂，外有夷狄之患的雙重困境，都來自於實行科舉制度，導致「虛文卑弱」的讀書人未能有效治理國政。如舉當時知名士人施渭南深怕荷蘭領事，「名人尚如此恐怖夷人，清國勢態，可堪慨嘆」(頁21)以及見上海人民因戰亂流離困苦的情景，不僅心生同情，甚至興發出若能「就彼為我邦之民，置為百工之地，亦可免於賊亂之苦，不必白白餓死而令人心痛可憐」，(頁25)雖不能說不出於真心感慨，但對於清朝國力的輕視，甚至想將他邦人民納入日本邦土，皆可見出往後日本富強，挾帝國主義之勢，大談「興亞論」的開端。³⁷另外，與蔡大鼎差不多時期入華的日本漢學家岡千仞亦對科舉之毒深有體認。其於1884年來華遊歷一年，特別考察清末社會的風俗與制度，他雖反對國內盲目從西之局勢，對於中國古典學問仍抱持深厚敬意；但亦在訪視中國時，將現代中國的積弱歸諸於「煙毒」與「經毒」。如其特別觀察那年科舉試題，訝異經註記誦繁瑣，不僅讓人消磨心志，導致「黃口入學，白首無成」，使世人「學之耗多少精神，已第就官，所行非所學，所學非所行。欲以此得全材，殆緣木而求魚者。況考試弊害，優者不

³⁶ 日・高杉晉作等著，陶振孝等譯：《1862年上海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20。

³⁷ 原文詳見：「偶有來旅館做風流之交者，皆難民中人。其中有秀才一人，哀清朝之衰政，頻頻景仰我邦，謂余：『現今眾多難民去國離鄉，前往貴國之長崎。古時亦有此類事，知貴邦本仁義之國，且與我邦唇齒相依。若諸公可憐吾輩，救倒懸之苦，召之為民，能長批恩澤，得安居。』言畢灑淚，以致余不堪哀憐之悲。故余思之，若就彼為我邦之民，置為百工之地，亦可免於賊亂之苦，不必白白餓死而令人心痛可憐。」頁25。關於日本帝國早期的亞洲主義，可參見日・狹間植樹著，張雯譯：《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1-315。

必中，劣者不必黜乎」³⁸，足以見出習得舉業，無補於身心家國。而其入華與中國人筆談，往往批駁他們好空談學問，是科舉制度下的陋習：

諸君業科舉，腹中萬卷，筆下千言，堂堂天下之士也。而今際國家大變，不能畫一策，出一奇，以濟天下之急，此無需於讀書學問也。方今宇內大勢一變，不可一日忽外事。³⁹

值得注意的是，岡千仞並不是反對讀書，而是反對讀八股以應舉，不足以應世變。因此，其特別點出若要濟天下之急難，「讀譯書」才是真正必要，能夠真有用於世，可見其早已深知「新學」之重要。⁴⁰這樣的言論與對學問的反省，其實並不僅有中、日，甚至已經是東亞知識人，如越南、朝鮮，皆因應國內危機情勢，而亟力開新、共享的知識環流。⁴¹如在 1883 年越南因法國問題遣使入京交涉，派遣阮文祥秘密傳達越南在面臨近代條約制度時，深知舊制不足，想革新國政的要求，如派遣外交使常駐北京，與洋人相同、設置領事往來與諸國開展外交，以及最重要的，提出越南是否能夠乘坐中國輪船，派出學人「遍往各國，如英、俄、普、法、美、奧、日等國探學」，以便學習各國的制度與文化。可見越南已深知宗藩關係即將落幕，新體制與新方法的學習亟是必要。⁴²越南對於西洋知識的涉獵欲求與汲取，也反映在范慎適、阮述等使京日記中，如《建福元年如清日程》、《往津日記》等，這容後詳述。從越南對於國情的變化與革新，可以看出其相較於琉球較早，也更具危機意識地認清到世局的變動。這與琉球脫清人仰賴清代宗主國的庇護較不相同，琉球知識人對於清朝的過於信任以及以漢學為中心的世界觀，使其相較於日、越兩國等，起步稍晚。若再從知識結構的相互環流來看，當時的東亞思想世界已呈現出多元思潮不斷交流、衝突的複雜面貌，知識人透過各式渠道而獲得的知識見聞，往往經過多種匯流與重構。如

³⁸ 日・岡千仞著，張明杰整理：《燕京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155、253。

³⁹ 日・岡千仞著，張明杰整理：《燕京日記》，頁 130-131。

⁴⁰ 有關「新學」的定義，雖指涉西學，但其實更多的是中西匯融後的學問。

⁴¹ 如金喜善相當關注清朝的洋務運動，已能從中感受到西方的現代性趨勢，關於帝國晚期朝鮮使節的見聞紀錄，可參韓・金景善：《燕轅直指》，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70-71 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45-416（第 70 冊）；頁 11-472（第 71 冊）。

⁴² 王志強、權赫秀等人承接濱下武志的說法，指出東亞朝貢貿易與宗藩關係並非一夕之間被西方近代條約關係所取代，而是經過一段漫長嵌合的過程。與其說被取代，毋寧說是將西方條約安放在其中，是並存共見的關係。故從越南最後的遣使外交事件可以看見，其所提出的要求，是想在宗藩關係之中加入近代外交，取得調整轉型，以改善當局困境。可參見王志強、權赫秀：〈從 1883 年越南遣使來華來看中越宗藩關係的終結〉，《史林》2011 年第 2 期（2011 年 5 月），頁 85-91。

最先領受到現代性衝擊的日本幕府薩摩藩，他們早在薩英戰爭中就認識到維新的必要性，進而派遣子弟出洋留學。⁴³

由上述可知，在這一波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新學傳遞的洋流之中，深受漢學浸潤的蔡大鼎，並未參與到這樣的景況。其雖乘搭輪船，接觸到洋務運動的最前端以及左宗棠等人籌辦的福建船政，當時中國發展近代海軍的景況與氣象，亦未能從其文中察見。

（三）記述風物人文、太平盛世之吉兆

上述已知，蔡大鼎對於北京風俗之異與道德之美的刻畫，在自然風土之上，雖有異地體驗之新奇，但仍不忘誦美北京，為王道之化，風俗最醇；在典章制度上，多關注當時科舉之制的謹慎與朝廟之嚴；在人物圖像上，則一反過往豔情之筆墨，集中心力描述節義死節之女子、忠孝之士，可見其視線焦點所在，全在凸顯中國風俗之美，是如何實踐並體現著儒家道德美善的盛美世界。如其於〈十八省城風俗記〉，節錄《大清縉紳全書》，主要以關注風俗記載為主，錄曰：

直隸順天府之俗，勁勇沈靜，禮義聲名，機茂純良，王化之始……江蘇蘇州府之俗，君子尚禮，庸庶敦厚，風俗澄清，道教隆治……安徽安慶府之俗，浮質簡約，人物清華……江西南昌府之俗，士好經學，民勤稼穡……浙江杭州府之俗，珍異所聚，商賈並臻，秀美人文，儒術盛……盛京奉天府之俗，民性樸實，雅尚詩書。（頁15）

在蔡大鼎筆下的中國，十八省的風俗幾乎皆是「尊禮」、「務本」、「清雅」等知禮通道的體現，似乎整個中國，無處不是禮義之邦。影響所至，所見人物無不是具有節義忠孝，如〈節孝記〉所記「烈女馬氏」、「孝女劉滿秀」、「孝子鄒祖甸」等，皆為「捐軀赴義，或割股療親，洵屬節烈可嘉，孝思不匱」，故皆欲「登錄」記之，以「永垂不朽」。又著〈善行記〉，記載中國當地孝行善舉傳播遠名者，並一一詳細將事況抄錄於雜記中，可見蔡大鼎是自覺且有意圖的，將此時中國的美善風俗與忠孝之人，著力彰顯。其不僅在所閱讀的報紙中特意載錄節孝大臣之群像，如〈忠孝難全記〉所述的李鴻章在任守制一事，以及〈褒獎林大

⁴³ 薩摩藩主島津家本身就對蘭學與洋學愛好，並關注於博物學等西洋知識。在1863年薩英戰爭失敗後，薩摩藩的危機意識更是加劇，使其有意推動留學團，並於1865年派遣留學生赴英學習，這對十九世紀後期薩摩參與的倒幕運動，實為重要關鍵。關於薩摩藩近代化萌動，可參王智迪：〈幕末薩摩近代化意識的萌動——以1865年薩摩藩遣英留學生為例〉，《大連大學學報》第37卷第2期（2016年4月），頁19-30。

人〉的林鴻年（1805-1885），無不是「德行純深」、「經術湛深，品行峻潔」（頁31），甚至連日常生活裡，亦隨時觀察所處人物的善美品性，如〈傭王氏記〉一篇，便是蔡大鼎記載自己居住在北京寓所時客店裡的夥計，載曰：

質而少言，強而多讓，未見不恭之心。兼之一年之久，不論夏冬，每日黎明起來，灑掃內外，及其四更時，必有起來，查看廚房埋火……一日一時，尚無有微病，而能盡其職。至若日買東西，概行公平，而未有損人利己，是以同炊人等，無不嘆美。（頁29）

蔡大鼎將其事蹟不避瑣碎的詳載記錄，甚至於篇名下細列其籍貫姓名，不僅彰顯此人之善，更有作傳以為其志錄存史之心。不難想見，其對京城地靈人才的備賞，實為了著力呈顯所在的京城，是一風俗醇厚，物產盛美，繁華奇觀屢出不窮，大為琉球所不及的首善之都：

茲管見論之，天下之人，皆隨其方位而有清濁強弱之殊，而況國之大小也。其畜生之類，無不一轍。本國之人，不啻文武各藝，不如於中國之人，一切藝術不可企及也。（頁16）

可見在其心裡，清帝國不僅內知禮達文，外亦展現興盛國力，實為太平盛世的最佳典範。但是，若觀照其他使節在北京的紀錄，其狀況可能就遠非蔡大鼎筆下所見的美好。如同治十一年（1868）年越南使節阮思僑（1822-1890）的《燕輶筆錄》筆下，就已隱微感受清朝國力的轉變。那年，阮思僑作為甲副使赴命進京，為北上四貢合進行動留下出使紀錄。日記記載著他至燕京後，邀當時朝鮮使臣金有淵、南廷順趙秉鎬相見，雖近在咫尺，但使臣皆礙於「中國法嚴」拒絕，但是「四譯館與本國使館相去只四五十步」，卻「不敢來」，加上當時清朝已被迫簽訂條約，多見洋人在京駐紮，氣氛戒懼森嚴，於是敏銳感知出清朝政局的重大變化：

中國自與洋約和以後，氣挫勢屈，雖京師根本重地，他亦雜處，不能禁。恐諸國窺其淺深，議其輕重，故於本國使與朝鮮使雖不顯禁其往來，而每每構閼，不得如從前之寬減，關於直隸都部官之戒飭與朝鮮使之不敢來會，蓋可見矣。（「燕京」目下

「二月初四日」條）⁴⁴

且阮思僑似乎從未遵守「人臣無外交」的潛規則，他在京時間不僅詳細記載內務府諭示等諸多事況，又常在京城於眾使節們打探朝鮮、琉球國內，甚至西洋人的情報。由此可知，越南使節因國內之變，使其在觀看外界的情景時，早已具有相當程度的危機意識，能夠較早發現中國與朝鮮等不足之處。因此，其眼中的北京，不僅已呈現國弱之狀，甚至綱紀敗壞，到了「不顧國體」的敗亡程度。如初八日記載他們一行人要離開京城時，委人雇車，但各店卻無一能接應，主要是出於兵部司想從這裡佔便宜，如曰「以為賣賂地步，伴送不肯受費，故兵部嚴飭車店，不得與使部雇借，賄賂公行，不顧國體，一至於此，可嘆也夫！」（頁 230-231）而等交涉完畢後，中途行程又常發生北京行政官員不斷縮減車數以求索金錢的狀況，整趟車程下來，既需要耗費大量金額，又拖宕無效率，不禁使阮氏等人感嘆「文紀綱壞一至於此耶？」（頁 234）北京人文素養的低落，對舉於蔡大鼎所描繪的京官之行慎，可若天壤。

不僅如此，地景文化的差異，亦如兩個極端世界般呈現於不同觀看者的眼中。蔡大鼎在北行時，觀察中國挑夫「拾馬糞者」已漸形成職業化，「往來不絕，逐去車馬，十里知遠，拾之如錢」，多帶著趣味眼光去描述之，甚至不無有讚賞聰明之嘆。但對照同時日本人眼中的中國，如小栗棲香頂（1831-1905）筆下的北京卻多是一個髒污臭穢，疾病叢生的世界。在其停留北京的一年中，可以看出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北京市容的髒亂與風俗。⁴⁵至於北京的治安風俗，亦未有如蔡大鼎所描述的醇厚樸實，如其特別記載寧波人對他的叮嚀「北京騙人之事往往如是」，⁴⁶如此看來，在小栗僧人的北京生活，不僅要小心糞土不分的北京街道，亦要擔心人心狡詐，並未感受到靠近帝都應有的人文德化之感。

⁴⁴ 越・阮思僑：《燕輶筆錄》，收入《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第 19 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80。

⁴⁵ 日・小栗棲香頂著，陳繼東等整理：《北京紀事北京紀游》（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26、40、41、53、100。又可參日・比野輝寬、高杉晉作等著，陶振孝等譯：《1862 年上海日記》，頁 18。中所反映出日本人對於氣味的敏感性：「野草沒路，棺材縱橫，草席裹屍，隨處遺棄。且值炎暑之氣，臭氣衝鼻，由此可知清國之亂政」。當時納富介次郎等一行人搭乘千歲丸商船來貿易出訪，更重要的是觀察中國對於世變的體悟，調查西洋勢力對中國產生的影響，而除了制度政治面之外，他們不約而同多是強調中國的髒亂，更引申出政治與潔淨的關聯。雖然此書是描寫上海，但卻可看見當時日本人眼中的中國有某種共通性，多認為中國是充滿穢臭之惡土。如他們坐船北上，同樣走水路，卻對混濁的河水極為驚訝與嫌惡，並對北京無廁、體質孱弱的中國百姓都有所批評，而一樣沿著河流北上的蔡大鼎，卻只有讚美與新奇，不僅毫無抱怨，反而大加盛讚。

⁴⁶ 日・小栗棲香頂著，陳繼東等整理：《北京紀事北京紀游》，頁 57。

那麼，我們可以問的是，這難道是因為日本那時已經西化進步，乾淨整潔，因此在觀看中國時，才會處處不能忍受嗎？而琉球則是落後於中國，他們市容是否又更遜於北京，才會讓蔡大鼎有猶入大觀園之琳瑯呢？我們可以從其他資料看見其實並不是如此。相比之下，琉球首里城的景況，在伯利（1794-1858）所撰的日記中，反而是特別「清潔」的，跟「中國所有都市的髒亂現象非常不一樣」。⁴⁷這樣看來，蔡大鼎到了比他國家還要不潔淨的地方，卻隻字未言，這選擇「不見」的背後，或許有其書寫意圖存在，刻意呈現出其現實下的中國，實是具備一切美好，不僅沒有戰亂與敗德，反而十足太平盛世景況。如在《雜記》中，蔡大鼎更是頻繁記載太平盛事方有的吉兆與祥瑞，如〈祈雨記〉所述：

竊聞上祈雨，此係莫大之典禮也。是以旱甚則祈，祈誠則沛，果得霖雨，……蓋上之至誠有感通於神明故也。……捧讀之下，自覺堯天舜日，其所行之善政亦不是過也。（頁27）

甚至怕寒苦冷的蔡大鼎，雖多書寫「苦寒」之狀，⁴⁸但若是瑞雪象徵，其多歡天喜地的記錄下來，如〈得雪記〉所載：

癸元日夜大雪，仍復下於翌晨。君臣上下胥喜氣重重，洵年豐之象也。……故特誌云：本八日，順天府奏京師得雪八寸有餘，是我輩北上以來未有者也。良可謂瑞雪矣。（頁22）

或者將下雪與良政、年豐等吉兆並觀之：

本念四日，順天府奏京師得雪一寸有餘，乃知盛世之行政，良有至精焉。……本月念二日昧爽，白雪滿庭，料知昨日皇上虔心祈禱，故上帝感降甘霖，令下民皆舒待澤之心，此則有感應之效，而年豐之兆也。（頁22）

⁴⁷ 如 1853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9 日在琉球訪問的柏利艦隊，進入首里城後曾詳細的記載琉球國情況，見《ペルリ提督日本遠征記》中 1853 年 6 月 6 日所載：「首里座落於海拔一百五十英尺高的地方，道路上有很多坡路和彎路。我從未看見過如此清潔的大都市街道，一片垃圾也沒看到，和中國所有城市的髒亂現象非常不一樣。」見日・金井圓譯：《ペルリ提督日本遠征記》（東京：雄松堂出版社，1985 年），頁 128。

⁴⁸ 如蔡大鼎記有〈苦寒記〉：「每屆冬至後，一百餘日間，凜冽嚴寒，無不透入肌骨，其苦難以名狀。迨節近清明，和風入戶，而一切動靜起居，纔見有所快意者焉。」又常寫自己老耄不耐寒，可見生長在琉球的蔡大鼎，實在不適應北方寒冷的氣候。見日・蔡大鼎：《北上雜記》，頁 24。

象徵吉兆者，不僅雪景，甚至旁及尋常動物的特殊情事。如其描述狗與貓，向來脾性不合，但自己在京城所養的狗貓二口，卻常同食同眠，「不唯我輩和順之效而已，則先報國運之祥」（頁21）這正可看出，蔡大鼎極為關注「天下太平之象」，不僅反映在其重視任何能被解釋為祥瑞的象徵上，甚至卜筮所得之吉，夢境所示之喻，諸凡能與國事平安聯繫者，皆特為書之。如見皇上祈雨得雨，亦思「本國一節，必有其人妥為結局。」、夜夢龍舟競渡，而卜得「平安」二字（頁21）、三更月夜醒來，見「紫氣東來」，便占卜一卦，得「國家復興之象」（頁24）。甚至與賓客交誼，贈得「總署報新禧」一句時，亦再三祈禱「所有國事，妥為結局，俾君臣上下均得再造，長依於光天化日之下。」（頁18-19）這正可看出，其書中屢屢描寫的太平盛世、豐年善政，其實心中都藏有為琉球國事祈禱的意涵。

再者，蔡大鼎常描述自己去關帝廟的祈禱事宜，如〈禱告記〉等篇所述，是為了「祈禱國事，每月朔或望日北上廟行之」（頁12），但所祈之事，皆不明確書寫，僅隱約寫道：「本初七上關帝廟祈禱救難。……按中朝另設良策，以興滅國之象也。」以及「本初四日，或曰『即今有事務問卜』，按此佳音之占，復應無差池焉。」（頁23），可見皆是因國事而卜，但具體之事，以及脫清諸人如何與中朝交涉、求援奔走狀況，皆未詳書。比若其在辛二月中所記，因事務「乃上於左中堂處」（頁23），下句卻又輕描淡寫的轉移焦點，帶到自己經過的街巷奇觀，多不勝數。但在太平無事的，恍若平常的日常生活中，仍是可以感受到蔡大鼎那份不明說的不安，只是都以卜卦來安放懸置的心念，甚至告訴自己，一切事象早已明朗可見，不必再占，如〈所思記〉：

爰稽流年運氣，則回日在邇也必矣。何以知之？舊年除夜，五更時分，有駭醒者，適有母貓，侵帳同眠，何其異之，是北行而來未有之矣，況屬新年元旦呼？從時厥後，在家之夢不少，豈非濟事京回之兆哉？何必問之於卜家。（頁23）

亦曾穩妥自信的認為，所有國事，正如所夢所卜之占般妥當，如其連記兩則日記曰：

節近春分，……客歲七月間，因未知國事，何日結局，與其吉凶，乃為之卜卦。……今夫溯其所占之旨意，皆無不相似，則國事一節，乃於本二三月間決成議歸局，不必挨言四月。

本二十一日，昨知悉總署因本國一節，乃於本十二日，特奉聖旨，將其照會移形日本國王，其略云前議未妥，一概除去，宜迅新行會商，此豈非興滅國之良策哉？因溯上年七月初六日，時已五鼓，適夢事竣回國，友朋來賀，醒後即占……龍屬三月，

則所有國事，妥為結局，勢必在其月令也，將見君臣上下均得再生，深戴皇恩憲德於無既焉。（頁28-29）

就兩條合觀，可以推測出蔡大鼎在得知清朝再度與日本進行會商之事時，是有多麼欣喜雀躍，甚至溯源自己過去所卜之吉兆，皆一一臨現，也預示了不消幾月，將能復國有望，事成歸國。可以看見「卜卦」對蔡大鼎而言，其實是安放自己不安卻無可作為的心。背後其實正可看出清廷對於琉球之事的延宕與拖沓，以及多次對其請願的拒絕。這些雖未被其書寫，但從幾則「隱喻」中仍可以感受到那份憂心與無奈。如其描寫喜鵲築巢，相向而呼，乃發畜類亦有「保護其雛之心」的感慨，下句「況人生乎哉？」（頁26）明顯可知是指向清朝怎可無保護臣屬宗藩之責，但卻也只能自我慰懷，如〈中心感記〉所記：

夫為國家之事，上自同寅下至從人，一蓋薙髮易服，不憚千里之遠，晉抵京師，其流離顛沛情形，何人聞之殊不憫側，而況日月兩輪，是天地眼，豈有坐視不援者哉？諸君請勿疑惑，故綴片言云爾。（頁22）

無論是從宗藩制度下，動之以理；從千里奔波之苦，書之以情。從情理角度而言，對於琉球「彙卵之急，百姓有倒懸之危」的亡國之際，蔡大鼎只能日夜仰望，求「中朝之興滅國，如大旱之望雲霓，神祇尚鑒」（頁17）他不僅絲毫未提在當時亦深有種種內外危急情勢下的清朝，早已自身難保，反而是不斷強化中國的武力與國勢，無論是對己寬慰的言說，還是對外而言的保障，試圖用文字來凸顯清朝的盛世感，似乎就能帶給他一線希望，彷彿琉球的存與滅，是掌握在清朝國力的盛衰下，隨著文化的堅守而不至於消逝。

明此，我們就能理解，蔡大鼎如此突兀的描述正在逐漸被列強欺凌的北京之「盛世」，其實是一種文學技藝，召喚昔日自身所學之文化禮樂，並在想像與虛構中，得到另一種「真實」的向度，並對之投以全幅信賴。如其從報上得知左宗棠回京管理兵部事務時，亦是「歡天喜地」，認為這應該是要訓練兵力，討伐日本的準備：

俄國曾懷侵吞伊犁之心，為此上年有欽差曾大人前詣俄國，以行會商，至本年春概有議成而無不虞之憂。然則從今以後，應該不必重辦軍務。惟是本月初十日，京報有云上諭本年輪應查閱福建、浙江、廣東、廣西四省營伍之期。福建即派何璟，浙江即派譚鍾麟，廣東即派張樹聲，廣西即派慶裕，逐一查閱，認真簡校，如有訓練不精，軍不齊者，即將廢弛之將……按此事專出於保護敝國之至意也？此豈非是林子敘死稟之力乎？（頁24）

當時清朝不僅有俄國之患，西方列強種種傾軋，如法國與越南紛爭之事，亦是當局所頭痛。蔡大鼎對於國際情勢之樂觀，甚至認為如今中俄之邊境，應已平定，不需再重辦軍務，清朝如此認真訓練，應當是林世功之死有了迴響，固有「本國之復興，不蔡（察）可知」，這樣自信期盼之語。

然而，其日記總是不會記載等待落空，或者祥瑞失效的「後來」之事，頂多只能發現，蔡大鼎對於國際情政，往往難以第一時間得到訊息。⁴⁹這顯示出，儘管身為琉球一方的交涉者，但他也沒有真正能參與決策、討論的餘地，只能仰賴官員轉交、投遞請願書。若我們再對看著同樣是遭逢事變，到中國乞求救兵的越南使節范慎適、阮述的進京狀況，就可以看出兩者因身分與地位而產生資訊與判斷的差異。如阮述在八月三十一日日記中記載：「中朝來文願為調停，又召余等至今詢問，乃講說既不能成，又畏縮趙趙不肯以兵船援，……而中朝不能保護藩封，不知何辭以自解於天下也？」⁵⁰兩人進京一年，這之中也已與李鴻章相見兩次，不僅筆談會面，亦商量對法政策，但他們仍覺得清朝給予的幫助緩慢畏縮，導致失去最佳時機。⁵¹文中更可見其對清朝直白的憤怒。但若回想蔡大鼎在京的六年間，唯一最能傳達憤怒的文字，只有以幽微的「鳩佔鵲巢」隱喻，輕諷日本強佔琉球，「宜哉！拙者莫如鳩，不能為巢」（頁26）對於清朝更是溫柔敦厚，並無隻字片語責怪，⁵²就可知兩者之別。

綜之，蔡大鼎並未真正參與外交情勢，琉球使與越南使雖都面臨亡國，而求救清朝，要求談判交涉，但相較於越南使節幾乎是可以如同正式外交身分參與救國商談，反觀蔡大鼎一行人，只能密度北京，雍髮換裝，以瞞過日人耳目。他接觸中琉間的資訊量，其實並

⁴⁹ 蔡大鼎並不能適度運用當時興起的港際情報體制，如越南使節等人般隨時掌握訊息，這已顯示出資訊流通的不對等。關於中國近代史、外交史的「港際情報體制」運作研究可參看朱瑪璣：〈外交情報與港際報業：以 1874 年台灣事件日、中兩國輪船運兵消息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93 期（2016 年 10 月），頁 1-39。此文以 1874 年日征伐牡丹社事件新興報業運作的消息為例，可以看出新聞資訊流通多把握在熟悉港際情報運作的報社要角上，而這正與當時發展出定期輪船航線及海底電纜等設施密切相關。

⁵⁰ 越·阮述著，陳荊和編註：《往津日記》，頁 49。

⁵¹ 關於中法越三國交涉事件，此處牽涉甚廣，非本文可處理。可見陳國保：〈越南使臣與清代中越宗藩秩序〉，頁 63-75。

⁵² 正如上里賢一所觀察，他注意到林世功的漢詩充滿敦厚溫和寧靜之氣，即使後來激烈自殺，但絕命詩亦是充滿忠孝之哀思，並無憤恨之怒。此可看出琉球儒者的恭順溫厚之心，雖遇至哀之事，但亦無痛恨叫囂之語。有關林世功漢詩文的介紹，可參看日·上里賢一：〈關於琉球知識人和動蕩時期的中國——為林世功和蔡大鼎中心〉，頁 67-78。

不異於一般百姓，皆只能仰賴京報、申報等報紙新聞知曉情勢。⁵³而其《記》中大部分的所見所聞，亦多幾乎都出於京報所述的事件以及逛買書舖所得來的筆記小說等近乎旅遊指南的書籍，無法真實得知當時的北京政局。這正好印證著《北上雜記》序文所寫的撰作因由，除了使節觀風紀俗的使命外，裡面那句「不可空過日子」，其實更為重要，為了提醒不要日子白過，蔡大鼎努力的書寫著小人物眼底的盛世與期待。這之中多少是出於他的詮釋與建構，試圖以雜記存史的用心。或許應該問的，不是什麼才是「真實」的北京，而是他筆下何以「盛世」。明白此寄託之心跡，才能理解何以琉球復國唯一希望——只有在想像一個不存在的盛世中國中才能得出。⁵⁴

四、結論

本文主要以蔡大鼎《北上雜記》一書為例，主要討論在近代風暴的前夜，籠罩在國際變局的琉球儒者如何選擇以風俗淳厚的「盛世」書寫來抵禦夾雜著西方帝國主義的日本霸權侵入之危機。同時，若將整個東亞朝貢秩序設為坐標，將琉球儒者的思想與應對分別與他國使節對照觀看，再從他們對於華夷秩序乃至風俗制度的不同思索，將更能貼近各國在冊封秩序崩解前的不同思想樣態。其中，琉球儒者的慕華觀最為深切，即便在清帝國已趨疲態之時，他們仍相信中國國力的強大，能為琉球返得一線生機。因此，在這樣全力信賴清朝的視點下，蔡大鼎在燕京的觀看，亦有其選擇的意圖，也就是他忽略了那些衰敗疲弱現實景況，以文學的技藝，虛構出一個太平無事的景觀，既是存史，亦欲以此建構出中琉共同持守的輝煌燦爛的文化中國。

⁵³ 如其記載自己訂閱的報紙價錢：「每日京報，月價票三吊。申報，月五吊也。各為用也，至廣矣，官商人等無不需之」，以及從申報中得知「本國事」，言琉球境內分裂為白、黑二黨，親日派與親中派相互傾軋，只能無可奈何。見日・蔡大鼎：《北上雜記》，頁11。

⁵⁴ 承蒙審查人提點，應當注意《北上雜記》所經歷的不同時空，預設讀者亦有不同。除了當下情境書寫、亦有事後出版潤飾、再刪改等，或許已有所不同。然而，因現存文獻的限制，本文僅能依據殘存文獻來看其所記錄的北京盛世樣貌，其所對話的讀者，除了自身外，亦有想像的他者在場與傳世的心願。但最重要的仍是藉文學的筆法，想像並「不存在」的盛世景觀，同時也召喚回「不存在」的琉球王國，對比於歷史向度的雙重「不存在」，自身書寫的虛構功能，不僅抵抗現實，亦能召喚文化記憶，反而成為另一向度的「真實」，得以從中實踐以雜記存史，以文化抵抗存亡的心願與期待。可見《北上雜記》實是蔡大鼎於漢詩技藝外的的文學技藝場域，「真實」雖難以辨認，卻得以在文學中實踐自我心願。

或許，我們可以說蔡大鼎的思想並不能代表整個琉球王國。但從現存資料來看，琉球內部親日派的資料並不多見，反而對於薩摩的仇恨與嘲諷，常流瀉於時人之口。⁵⁵再者，琉球對於中國文化的親近與汲取，一直都是球儒思想的重要資源，從慕華球儒的大量詩文以及琉球王國滅亡後，士族不外奔走入華，或者留在國內聯合實施對於日本統治的不流血反抗，種種都可顯示著琉球人們對於華夷秩序的信奉仍是佔大多數。因此，透過蔡大鼎而符應出的儒家情懷，我們可以窺見琉球處在中日後新舊帝國交接的時期所展現的行動樣態。⁵⁶正如白永瑞指出帝國與周邊國家有一定的權力位階，「用帝國的視角來比較近代以前和以後的東亞秩序的運作方式。如此不僅可以更有效地分析各秩序的調整，而且能夠更好地理解各秩序之間的連續性。」⁵⁷可見中國帝國概念不同於西方帝國統治下的絕對支配關係，而是屬於不對稱的寬容秩序。朝貢冊封秩序下的文化施措，亦隨被冊封國而展現各地不同的異質性，透過雙方向的對抗與變化來完成。在比較日本、朝鮮、越南等周邊國家後，便可知道，周邊並非能永遠被視為周邊，而是早已具有中心位置，甚至根本取消此位置的預設，隨著其他秩序的牽引與進入，亦愈發有著不穩定性。如此，各國在面臨危機時，亦因文化掌握熟練度與反思度而有不同層次的理解與因應。

若從本文的個案來看，蔡大鼎嚮往的文化中國，則反映出球儒所接受的文化禮義價值，與其他東亞各國的知識脈絡不同，因其畢生所學，主要仍是以中華文化繼承者自居，盼求王國的穩定，較無興發反省動能與憂患意識。然而，蔡大鼎的知識脈絡與視野景觀，亦能讓我們看見當時未能掌握權力結構與發聲位置的「小儒」，是如何在國家崩解的危機時刻下，傾盡所學以求有用於世。儘管未能拔尖留名，但我們亦不能忽視小儒的思想，其實才是當時沈默歷史中的重要底蘊。⁵⁸

⁵⁵ 1609年，薩摩侵入琉球，強迫琉球入貢，琉球不得已進入了中日兩屬時期。儘管皆屬朝貢，但薩摩不同於中國對琉球國政的尊重，不干涉內政外交，其實行「在番奉行」政策，派遣官員常駐館舍，以便控制對外貿易；又強迫琉球繳納大量物資朝貢，比起中國的回賜，多為單向要素，以致琉球上下皆不若對中國般感到心悅誠服，此點可從嘉靖年間，作為冊封使陳侃《使琉球錄》的側記中得見端倪，如陳侃在《使琉球錄》中記載其作為明朝冊封使的官方身分到琉球，琉球王卻延遲多日才至館相訪受封，而琉球王尚清解釋原因時說道：「日本人寓茲，狡焉不可測其衷，俟其出境而後行」，此句雖曖昧模糊，但卻可見其對日人的態度。

⁵⁶ 必須說明的是，中日兩國的帝國性質，並非相同概念，甚且，十九世紀以降，東亞國際關係中的內在秩序正面臨著中華「帝國」到日本「帝國」的轉換，這個轉換卻是斷裂且異質的。如白永瑞所指出，日本的帝國受到近代世界價值觀的影響，只能稱作「准帝國」，帶有「帝國主義」特質，雖有受到「天下一統」的集體性帝國話語的邏輯運作，但性質仍是不同。見韓·白永瑞：《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臺北：唐山出版社，2009年），頁1-312。

⁵⁷ 韓·白永瑞：《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頁3。

⁵⁸ 此處「小儒」並不一定然指涉為黃宗義所批評的「小儒規規焉」，而是林麗月在〈小儒的風俗論：晚明幾種地方憶述文獻〉所指出相較於眾所皆知的大人物，地方儒者，或許更能反映當時歷史之實相。

隨著時代變遷，前近代的價值正逐一崩解。中國對於琉球的無力救援，以及救援行動與願望最終在甲午戰爭的「失敗」中，徹底化為泡影。堅守儒學信念的琉球滅亡成為隱喻，意謂著繼承中國文化志業的琉球，在某種形式上已成為未來中國的縮影，它的滅亡也寓示著未來中國被迫進入國際秩序，接受現代性衝擊的命運象徵。

見林麗月：〈小儒的風俗論：晚明幾種地方憶述文獻〉，中國明史學會主編：《第十屆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04年8月），頁394-398。

徵引文獻

古籍

- 明・陳侃 CHEN, KAN:《使琉球錄三種》*Shi Liu Qiu Lu San Zhong* (臺北 Taipei: 大通出版社 DaTong Publishing House, 1984 年)。
- 日・小栗栖香頂 OGURUSU KOUTYOU 著, 陳繼東 CHEN, JI-DONG 整理:《北京紀事北京紀游》*Bei Jin Gji Shi Bei Jin Gji Yo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8 年)。
- 日・岡千仞 OKA SENJIN 著, 張明杰 ZHANG, MING-JIE 整理:《燕京日記》*Yan Jing Ri 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9 年)。
- 日・高杉晉作 TAKASUGI SHINSAKU 等著, 陶振孝 TAO, ZHEN-XIAO 等譯:《1862 年上海日記》*1862 Nian Shang Hai Ri 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2 年。
- 日・策彥周良 SAKUGEN SHURYO 著, 日・牧田諦亮 MAKITA TAIRYO 編:《策彥入明記の研究》*Ce Yan Ru Ming Gi Yan Jiu*, 收入《策彥和尚初渡集》*Ce Yan He Shang Chu Du Ji* (京都 Kyoto: 法藏館 Fa Zang Guan, 1955 年)。
- 日・蔡大鼎 CAI, DA-DING:《北上雜記》*Bei Shan Gza Ji*, 收入日・高津孝 TAKATSU TAKASHI 編:《琉球王國漢文文獻集成》*Liu Qiu Wang Guo Han Wen Xian Ji Cheng* 第 28 冊(上海 Shanghai: 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年)。
- 日・蔡大鼎 CAI, DA-DING:《北燕遊草》*Bei Yan You Cao*, 收入日・高津孝 TAKATSU TAKASHI 編:《琉球王國漢文文獻集成》*Liu Qiu Wang Guo Han Wen Xian Ji Cheng* 第 28 冊(上海 Shanghai: 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年)。
- 日・蔡大鼎 CAI, DA-DING:《欽思堂詩文集》*Qin si tang shi wen ji*, 收入日・高津孝 TAKATSU TAKASHI 編:《琉球王國漢文文獻集成》*Liu Qiu Wang Guo Han Wen Xian Ji Cheng* 第 26 冊(上海 Shanghai: 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年)。
- 越・李文馥 LI, WEN-FU:《閩行裸詠》*Min Xin Gza Yong*, 收入《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Yue Nan Han Wen Yan Xing Wen Xian Ji Cheng* 第 12 冊(上海 Shanghai: 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0 年)。
- 越・阮述 RUAN, SHU 著, 陳荊和 CHEN, JING-HE 編註:《往津日記》*Wan Gjin Ri Ji* (香港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80 年)。DOI: 10.978.962201/2158。

- 越・阮思憫 RUAN, SI-XIAN:《燕輶筆錄》*Yan Yao Bi Lu*，收入《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Yue Nan Han Wen Yan Xing Wen Xian Ji Cheng* 第 19 冊(上海 Shanghai: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0 年)。
- 越・黎貴惇 LI, GUI-DUN:《北使通錄》*Bei Shi Ton Glu*，收入《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Yue Nan Han Wen Yan Xing Wen Xian Ji Cheng* 第 4 冊(上海 Shanghai: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0 年)。
- 韓・金景善 JIN, JING-SHAN:《燕輶直指》*Yan Yuan Zhizhi*，收入林基中 LIN, JI-ZHONG 編:《燕行錄全集》*Yan Xing Lu Quan Ji*，第 70-71 冊(首爾 Seoul:東國大學出版社 Dong Guo Da Xue Chu Ban She, 2001 年)。

近人論著

- 王志強 WANG, ZHI-QIANG、權赫秀 QUAN, HE-XIU:〈從 1883 年越南遣使來華看中越宗藩關係的終結〉“An analysis on the End of Suzerain-vas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with a Focus on Vietnam's sending of envoys in 1883”，《史林》*Historical Review* 2011 年第 2 期（2011 年 5 月），頁 85-91。
- 王振忠 WANG, ZHEN-ZHONG:〈琉球漢文燕行文獻的學術價值——以晚清蔡大鼎的《北上雜記》為例〉，“Liu Qiu Han Wen Yan Xing Wen Xian De Xue Shu Jia Zhi Yi Wan Qing Cai Daliding De Bei Shang Za Ji Wei Li”《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4 年第 2 期（2014 年 3 月），頁 88-100。
- 王智迪 WANG, Zhi-Di:〈幕末薩摩近代化意識的萌動——以 1865 年薩摩藩遣英留學生為例〉“The Appearance Of Modernity In Late Satsuma Period——Overseas Students Of Satsuma In Britain In 1865”，《大連大學學報》*Journal of Dalian University* 第 37 卷第 2 期（2016 年 4 月），頁 19-30。
- 朱瑪瓏 ZHU, MAR-LON:〈外交情報與港際報業：以 1874 年台灣事件日、中兩國輪船運兵消息為例〉“Diplomatic Intelligence And Inter-Port Journalism: The News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Troop Steamers During The Formosa Incident Of 187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第 93 期（2016 年 10 月），頁 1-39。
- 米慶餘 MI, QING-YU:《琉球歷史研究》*Liu Qiu Li Shi Yan Jiu*（天津 Tianjin: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 jin Ren min Press, 1998 年）。
- 李焯然 LEE, CHEUK-YIN:〈越南史籍對「中國」及「華夷」觀念的詮釋〉“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cepts Of "Zhongguo" And "Huayi" In Vietnamese Historical Writings”，《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Fudan Journal(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8 年第 2 期（2008 年 3 月），頁 10-18。

金觀濤 JIN, GUAN-TAO、劉青峰 LIU, QING-FENG：《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Zhong Guo Xian Dai Si Xiang De Qi Yuan : Chao Wen Ding Jie Gou Yu Zhong Guo Zheng Zhi Wen Hua De Yan Bian*（香港 Hong Kong：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2000 年）。DOI：10.978.962201/9195。

林明德 LIN, MIN-DER：《袁世凱與朝鮮》*Yuan Shi Kaiyuchao Xian*（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1984 年）。DOI：10.7008/MHAS.YSAK00001。

林麗月 LIN, LI-YUEH：〈小儒的風俗論：晚明幾種地方憶述文獻〉“Xiao Ru De Feng Su Lun Wan Ming Ji Zhong Di Fang Yi Shu Wen Xian”，中國明史學會 The Association for Ming Studies 主編：《第十屆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Di Shi Jie Ming Shi Guo Ji Xue Shu Yan Tao Hui Hui Yi Lun Wen Ji*（2004 年 8 月），頁 394-398。

張明明 ZHANG, MING-MING：〈文學書寫中的晚清郵驛場景——以琉球文獻《北燕游草》為中心〉“Wen Xue Shu Xie Zhong Di Wan Qing You Yi Chang Jing——Yi Liu Qiu Wen Xian Bei Yan You Cao Wei Zhong Xin”，《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6 年第 5 期（2016 年 9 月），頁 65-70。

張明明 ZHANG, MING-MING：〈「異域之眼」中的晚清鏡像——以琉球漢文筆記《北上雜記》為研討中心〉“Eye of Foreign Countries in Late Qing Dynasty——Taking Going North Miscellanea as the Research Object”，《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2019 年第 6 期（2019 年 11 月），頁 88-100。

張啟雄 ZHANG, QI-XIONG 等編著：《琉球認同與歸屬論爭》*Liu Qiu Ren Tong Yu Gui Shu Lun Zheng*（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Dong Bei Ya Qu Yu Yan Jiu，2001 年）。

張崑將 CHANG, KUN-CHIANG：〈越南「史臣」與「使臣」對「中國」意識的分歧比較〉“Comparison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as Expressed by "Official Vietnamese Historians" and "Vietnamese Envoys"”，《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Taiw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第 12 卷第 1 期（2015 年 12 月），頁 167-191。DOI：10.6163/tjeas.2015.12(1)167。

梁其姿 LEUNG, KI-CHE：《麻風：一種疾病的醫療社會史》*Leprosy In China: A History*（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 Wu Yin Shu Guan，2013 年）。

陳益源 CHEN, YI-YUAN：《越南漢籍文獻述論》*Yuenan Han Ji Wenxian Shulu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11 年）。

- 陳國保 CHEN, GUO-BAO :〈越南使臣與清代中越宗藩秩序〉“Vietnam Envoys and Sino-Vietnam Suzerain-vassal Rel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清史研究》*The Qing History Journal*2012 年第 2 期(2012 年 6 月),頁 63-75。
- 陳國保 CHEN, GUO-BAO :〈馳驅臣分敢言勞,事濟功成皆國慶——清代越南入華使臣的考察〉“Of Personal Obliga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A Study of Vietnamese Envoys to China in Qing Dynasty”,《清史研究》*The Qing History Journal*2017 年第 3 期(2017 年 8 月),頁 94-111。
- 楊仲揆 YANG, ZHON-GKUI :〈琉球古今談——兼論釣魚臺問題〉*Liu Qiu Gu Jin Tan——Jian Lun Diao Yu Tai Wen Ti*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90 年)。
- 葛兆光 GE, ZHAO-GUANG :〈文化間的比賽:朝鮮赴日通信使文獻的意義〉“Contest among Cultures:Significance of the Records of Joseon Missions to Japan”,《中華文史論叢》*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2014 年第 2 期(2014 年 6 月),頁 1-61。
- 廖肇亨 LIAO, CHAO-HENG :〈從《琉球百問》看清代中葉琉球貴族的疾病與社會生活〉“The Illness Of Nobles & Social Life In Liu-Qiu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Qing Dynasty Seen Through “100 Questions About Liu-Qiu””,《浙江工商大學學報》*Journal of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第 6 期(2010 年 11 月),頁 39-43。
- 廖肇亨 LIAO, CHAO-HENG :〈來讀天都未見書:從官話課本看十八世紀琉球渡唐生的中華體驗〉“Lai Du Tian Du Wei Jian Shu Zong Guan Hua Ke Ben Kan Shibashi Ji Liu Qiu Du Tang Sheng De Zhong Hua Ti Yan”,收入林文月 LIN, WEN-YUEH 等編:《鄭清茂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Zheng Qing Mao Jiao Shou Ba Zhi Hua Dan Zhu Shou Lun Wen Ji* (花蓮 Hualien :國立東華大學出版社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Press, 2013 年),頁 133-166。
- 廖肇亨 LIAO, CHAO-HENG :〈近世東亞海域與文化交流專輯導言〉“Jin Sin Dong Ya Hai Yu Yu WenHuaJiaoLiu Zhuan Ji Dao Yan”,《中國文哲研究通訊》*Newsletter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第 26 卷第 1 期(2016 年 3 月),頁 1-4。
- 廖肇亨 LIAO, CHAO-HENG :〈星槎收盡域中奇:從《中山詩文集》看琉球漢詩中的自然風物與人文景觀〉“Contemplating The Natural Scenery And The Cultural Landscape In Han Poetry In Ryukyu From The Chūzan Shibunshū”,《中國文哲研究通訊》*Newsletter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第 26 卷第 1 期(2016 年 3 月),頁 5-25。
- 鄭樸生 CHENG, LIANG-SHENG :〈嘉靖年間明廷對日本貢使策彥周良的處置始末〉“Ming Court's Dealing with Japanese Tribute-bearer Sakugen Siuriyo during the Period of Jia-jihng”,《漢學研究》*Chinese Studies* 第 6 卷第 2 期(1988 年 12 月),頁 191-211。
- 日・上里賢一 UEZATO KENICHI :〈關於琉球知識人和動蕩時期的中國——為林世功和蔡大鼎中心〉“On A Ryukyuan Intellectual And Convulsion Period Of Cnina——Lin Shigong And

- Caidading”，《國文學論集》*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Japanese Literature* 第 30 期（1986 年 3 月），頁 67-78。
- 日・西里喜行 NISHIZATO KIKO：《琉球救国請願書集成》*Petitions for Salvation of Ryukyu Kingdom*，收入《沖繩研究資料》*Okinawan Studies* 第 13 冊（東京 Tokyo：法政大學沖繩文化研究所 Hosei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Okinawan Studies，1992 年）。
- 日・赤嶺守 CHI, LING-SHOU：《清末琉球復國運動之研究》*The Ryukyu Kingdom: Cornerstone of East Asia*（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istory Doctoral Thesis，1990 年）。
- 日・金井圓 KANAI MADOKA 譯：《ペルリ提督日本遠征記》*Peri Teitoku Nihon Enseiki*（東京 Tokyo：雄松堂出版社 Yuusyou Dousyo Press，1985 年）。
- 日・狹間植樹 HAZAMA NAOKI 著，張雯 ZHANG, WEN 譯：《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Ri Ben Zao Qi De Ya Zhou Zhu Yi*（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7 年）。
- 日・高津孝 TAKATSU TAKASHI：〈蔡大鼎の漢詩文と琉球の遊里〉“Prostitutes And Licensed Quarters In Ryukyu, Described In The Anthology Of Sai Taitei's Chinese Poetry”，《鹿大史學》*Kadai Shigaku* 第 63 卷（2016 年 2 月），頁 1-28。
- 日・高津孝 TAKATSU TAKASHI：〈琉球的出版文化與琉球漢詩集〉“The Publication Culture of Ryukyu and the Ryukyu Anthologies of Chinese Poetry”，《人文中國學報》*Sino-humanitas* 第 22 期（2016 年 5 月），頁 279-303。
- 日・紺野達也 KONNO TATSUYA：〈琉球漢文學者蔡大鼎の晩年に關するいくつかの新知見：『北上雜記』・『北京話』を中心に〉“Some New Informations About the Later Life of SAI Taitei, a Ryukyuan Writer Who Wrote in Chinese -Speculating on Hokujo Zakki and Pekin Wa”《中國詩文論叢》*Chugo ku Shi bun Ron soy* 第 34 集（2015 年 12 月），頁 187-222。
- 日・濱下武志 TAKESHI HAMASHITA：《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Jin Dai Zhong Guo De Guo Ji Qi Ji——Chao Gong Mao Yi Ti Xi Yu Jin Dai*（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 年）。
- 美・蘇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臺北 Taipei：大田出版社 Da Tia Publishing House，2005 年）。
- 韓・白永瑞 BAIK, YOUNG-SEO：《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East Asia as Intellectual Thought: History and Pract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orean Peninsular*（臺北 Taipei：唐山出版社 Tang Shan Press，2009 年）。

Ryukyu intellectual in the period of the country destroyed

A disscition on the writing of the "prosperous times" in

"Miscellaneous to the North"

WANG, YU-TZU

(Received October 12, 2020 ; Accepted December 1, 2020)

Abstract

"Miscellaneous to the North" is the work of Cai Dading, an intellectual of Ryukyu, who stayed in Beijing during the six years before and after Japan invaded Ryukyu and abandoned the feudal clan and set up the county.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how Cai Dading, the last Ryukyu dynasty, was exposed to turbulent times and tried to use miscellaneous stylistics to express unclear political writing intentions. His book specifically records the picture of Beijing's "prosperous age", although it seems to be the same as tourism travel notes, but Comparing the descriptions of Beijing by the envoys of the same period, we can know the truth that is ready to come out of the imagination and reality. And understand how Ryukyu intellectuals us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when the order is disintegrating and the country is on the verge of subjugation, using the flourishing age of literature as a call to memory and resisting the writing intention of transcending reality. As the best testimony of the times, "Miscellaneous Notes on the North" is even more worthy of our attention

Keywords:Cai Dading, "Miscellaneous to the North", Ryukyu, Writing strategy, Flourishing age